

# 近代天津教育中的陆军军医学堂

王伟凯



作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汇集地,近代以来,天津教育发展颇为兴盛,除新式普通学校教育外,专门的近代化医学教育也引进天津,如北洋医学堂和北洋军医学堂的创建就是明显的标志。

北洋医学堂又名天津医学堂,始建于清光绪十九年(1893)十一月,地址位于天津海大道(今大沽北路),学堂按照西方医学校的标准设置课程,并聘请中外医生担任教习。

除北洋医学堂外,1902年十一月,袁世凯在天津又创办了北洋军医学堂,进行军医方向的专业培养。从北洋军医学堂毕业的学生,“列入优等学生,派赴东西各国学习,由官给费。列入次等者,则发给文凭,派赴各营充当军医”,如首期学生毕业后,大部分就被学堂派往各处军营担任副医官和医长。

## 北洋军医学堂的创建

1901年十一月,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曾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对军医情况很是了解。袁世凯认为,“军政之不振,多由军学之不精,实由科学之不讲。东西各国,崇尚教育,医技器械皆设专科,以专科之学问,定军佐之职司,是以士饱马腾,虽裹创异伤而愈奋……臣援遵照新章,参酌西法,谨于武备各学堂外,区设专门各学堂,曰军医学堂”。

1902年九月,清政府批准在天津设立行营军医学堂,“以为养成军医人材之所”,并命名为北洋军医学堂,同时任命天津候补道徐华清为总办、唐文源为监督,聘日本二等军医正平贺次郎为总教习,正式启动招生工作。“北洋军医学堂奉委凌太守(天津知府凌福彭)招募学生一则,业志本报,兹闻定于二十一日起,所有赴府投考者,均须开明年貌、三代、籍贯、取具、妥保,凌太守一面挑选,一面订于十一月初二日在辅仁书院当堂会考”。

关于考试题目,当时的《大公报》在1902年12月6日“中外近事”栏目进行了详细报道,“军医学堂于初二日在辅仁书院招考学生,兹闻是日辰时,总办徐观察华清、天津府凌太守并日本教习诣场监试,投考学生百余名。今将各题录下,汉文题:直隶海口及内地防疫办法见闻大略;英文题:水学化学翻译一篇、算学一篇;法文题:祝军医学堂文题一篇;日文题:水学化学翻译题各一篇。”通过考题可见,学堂对考生的外文水平要求颇高,且需要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者才能应对考试,所以报考的学生多是在同文馆(清末建立的以培养外语翻译、洋务人才为目的的专门外语学校)学习过的学员。最后从百名考生中录取了正生40名,备生6名。转年6月又通过复试,从46人中录取了37人作为正备生,其余9人则作为附学生。

北洋军医学堂设立之初,就做了修建校舍的规划和准备,但因开学迫在眉睫,于是便将天津东门外南斜街原浙江海运局作为临时校舍,学堂面积虽然较小,但整体环境还不错,“略种花草,明媚芬芳,风景清幽,尚勤小住”。学堂开办后,袁世凯感觉“海运局地基狭小”,于是一度将学堂迁至陆军医院内,同时又与北洋医学堂协商,拟借用该学堂地方,然由于其所能挪让者“又为铁路局办公之地,一时未能腾让”,遂议定“在三叉河口东关地”另建新址。

## 历史随笔

### 刘晏的“正”

清风慕竹

宋人王应麟《三字经》里曾写道:“唐刘晏,方七岁。举神童,作正字。彼虽幼,身已仕。”唐朝的刘晏,七岁时通过“童子科”考试,获得神童之名,唐玄宗亲自封他为太子正字(校正典籍的官职)。这个“正”字,成了刘晏一生为官的写照。刘晏的“神童”美誉绝非浪得虚名,年少的他就极具远见。唐玄宗封禅泰山,曾在泰安接见刘晏,看着眼前这个孩子,他半开玩笑似的问他:“你这个太子正字,正得几字啊?”刘晏认真地回答说:“天下字皆正,唯有‘朋’字未有正得。”天下的字都能正,只有这个“朋”字正不了。这句话有一语双关的意思,从字形上说,“朋”由两个“月”并列,结构倾斜难正;另外也暗指玄宗朝虽然历经“开元盛世”,但朝廷中朋党勾结,结党营私的官场痼疾已经十分严重。

事实上,刘晏入仕后,一直身处正与邪的较量之中,但他始终站在正义一方,正直做人、公正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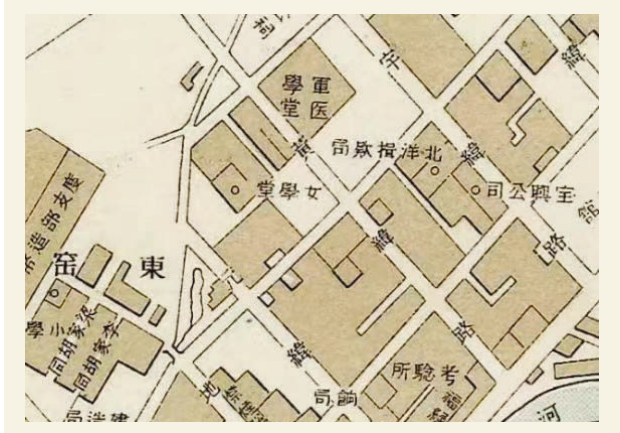
刘晏担任过转运使、度支使、铸钱使和盐铁使等官职,主要是掌管天下钱粮,为国理财。在他任职初期,政府每年赋税收入不过四百万缗(古代一千万铜钱穿一串,为一缗),到他任职后期,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,翻了一倍半。他让赋税收入增加,靠的不是盘剥百姓以增加自己的政绩,他发展经济的路数很正。

刘晏理财的理念是“理财以爱民为先”“户口滋多,则赋税自广”。意思是说,理财要以爱护百姓为首要原则,百姓生活好,人口繁衍多,赋税自然就能增加。他当初担任转运使时,就命各道的巡院都招募快骑,每隔不远的距离就设置驿站,他们负责探访报告各地的物价,即使遥远地方的物价信息,不用几天也能送到转运使官署。这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市场物价监测系统,刘晏据此来调动粮食,平抑粮价,使百姓免受物价暴涨暴跌之苦。

由于当时社会比较封闭,人们对近代医学认知基本处于懵懂状态甚至存在盲区,于是在1903年出台的《军医学堂章程》中就推行近代医学向社会进行了解释,“军医专习西法,行军所需药物以简为要,华医药味太多,不易齐备,不若西医用法捷而备药简也”“军医以伤科为重,凡跌打损伤等症,中医旧传有妙法验方,亦须学习,以助西法之不足”。

在课程设置和管理上,学堂则借用新式教育的方式和理念制定了管理办法,从培养目标、课程、报考要求、待遇和出路等方面作了严格规定:(一)目标:专以培养陆军军医人才为宗旨。学生毕业后直接向各营派遣,充当医官,不准另就他业。(二)课程:以研究东西医学为正课,兼习物理、化学,以及英文、日文和国文。其课程第一年是:物理学、化学、动植物学、生理学、组织学及实习、胎生学、算学、汉文、日文、英文;第二年是:解剖学、生理学及实习、病理学、病理解剖学、诊断学、外科总论、药理学、汉文、日文、绷带学、药方学;第三年是:内科学、外科分论、眼科学、产科学、妇科学、婴科、传染病学、普通卫生学、内外科验诊、汉文、日文、军营外科学、军营卫生学;第四年是:内科学、外科分论、眼科学、皮肤病学、耳鼻咽喉科学、产科实习、细菌学、法医学、精神病学、内外妇儿各科验诊、军队卫生事务、军事学、汉文、日文、学堂卫生学、工业卫生学等。(三)报考要求:年龄须在18岁至25岁,资质聪敏、身体强壮、文理通顺者,在考试基础上,准许临时入学。三个月后经过复试合格,准许正式入学。(四)待遇:一切学资由官方供给,每月供给饭菜费4两,另外给予零用钱,上级生每月6两,下级生每月3两,其他还供给笔、纸、墨、书籍以及茶、灯、烛等。在年终考试中考达到最优等者,酌给奖赏,连续获得优等者,每月增给零用钱作为奖励。(五)出路:毕业后担任军医长,经过三年任职,由练兵处选拔成绩显著者担任副军医官,经过六年任职且工作勤劳卓著,升任正军医。此外,还选拔毕业生中优等者,到海外学习专门医科。

1904年秋,根据教学需要,学堂决定增设解剖学科,由于解剖学是一门实操课程,而当时“中国风气未开,不敢骤然试



学堂在天津的位置地图(绘制于1913年5月)

验,仅以猪羊等畜代之”。1906年,总教习平贺次郎“以解剖课程仅系纸上空谈,不若实行经验,特从外洋购来全猪人型一具,令各学生一一拆卸,复一一安接,以期久久习验,洞悉人身作用”。同年,学堂新校舍在今河北区黄纬路落成,学校正门朝南,校舍为欧式建筑,能容纳200多名学生,与当时的马公祠毗邻。

## 北洋军医学堂的更名

在发展过程中,学堂不断完善设施和学科建设,包括建立附属医院,增设药科、防疫科等。如1905年在水师营旧址成立天津官医院,作为北洋军医学堂的附属医院,同时“分设官医院一区,内设药剂,所拨学生数名,专习调和药品之术”。1906年春夏之交,又开办防疫医院,“招考学生一班,专门肄习牛痘,一年毕业后,派赴卫生局所,充当军医”。附属医院总办由学堂总办徐华清兼任,但医院规模较小,只能收容三十个病人,“只有教学用患者、中国的军人及巡警等,才准许住院”。学堂的各位教习轮流到医院开展工作,一是为学生进行临床讲授,二是对患者进行诊疗。

1906年,清政府组建陆军部,下设军医司,掌管全国陆军的卫生、医疗、医药和军医教育等事项。1907年陆军部接管北洋军医学堂,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堂,并修订公布了《军



1906年北洋军医学堂发给该校毕业生刘国庆的毕业证书

### 吟诗诵词迎元旦

钱国宏

孩童欢歌、老人怀怀尽数描绘,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,宛如一幅动感十足的新年嬉乐图。唐代诗人孟浩然则将目光投向了田间地头,他在《田家元日》中写道:“昨夜斗回北,今朝岁起东。人年已强仕,无禄尚忧农。桑野就耕父,荷锄随牧童。田家占气候,共说此年丰。”北斗星斗柄转北,新岁开启,已过四十的诗人虽未得俸禄,仍牵挂着农事。他走到田间与耕父闲话,跟着牧童的身影漫步,听闻农人依据天象预测今年丰收,心中满是欣慰。这首诗没有宴饮欢歌,却将农家元旦的质朴与对丰年的期盼写得真切动人。清代诗人张维屏的《新雷》更显巧妙,全诗未提一个“元”字,却处处透着元旦的生机:“造物无言却有情,每于寒尽觉春生。千红万紫安排著,只待新年第一声春雷响起,便绽放万紫千红,将人们迎新春的喜悦藏在了自然景致之中。

王安石的《元日》是历代元旦诗词中流传最广的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屠苏酒的暖意、初升朝阳的光辉、新换桃符的鲜亮,交织成一幅热闹祥和的新年图景。更难得的是,这首诗还藏着诗人推行新政的豪情——彼时王安石初任宰相,决心革除弊,诗中“换旧符”,抒发的是他破旧立新政治抱负的决绝。王相在《增补重订千家诗》中点评道:“此诗自祝其初拜相时的行君政,陈旧布新,顺始行己之政今也”,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诗句背后的深意。

进入现代,元旦的内涵有了新的延伸,诗词也随之承载了更宏大的精神力量。毛泽东的《如梦令·元旦》便是如此:“宁化、清流、归化,路隘林深苔滑。今日向何方,直指武夷山下。山下山下,风展红旗如画。”这首词没有传统元旦的欢腾景象,却以简洁有力的笔触,记录了红军行军的路线与方向。山路崎岖、青苔湿滑,红军战士却目标坚定,直指武夷山下,那面风招展的红旗,既是革命理想的象征,也为元旦注入了无坚不摧的奋进力量,读来令人热血沸腾。

“天地风霜尽,乾坤气象和。历添新岁月,春满旧山河。”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公历1月1日,“元旦”的日期虽有变化,但它所承载的辞旧迎新的期盼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未改变。

宋人吴自牧在《梦梁录》中记述:“正月朔日,谓之元旦,俗呼为新年。一岁节序,此为首。”在古代,岁首之日并不是今天我们认定的公历1月1日,而是农历正月初一,是百姓口中最隆重的“新年”。作为辞旧迎新的节点,元旦历来是文人墨客的吟诵热点,元旦的文化脉络也因此在此平仄韵律中代代相传,至今读来仍唇齿留香。

古代元旦之日,最盛大的场面莫过于宫廷朝会。南朝梁代沈约的《梁三朝雅乐歌》便为后世留下了生动记录:“四气新元旦,万寿初今朝。趋拜齐奏玉,钟石变箫韶。”玉饰的朝服在晨光中齐整排列,雅乐从钟石之声转为箫韶之韵,字句间尽是对国运昌隆的祈愿。三国时期,曹植的《元会》则描绘了宴饮的热烈:“初岁元祚,吉日惟良。乃为嘉会,宴此高堂。”文武重臣齐聚高堂,举杯共贺新岁,尽显曹魏宫廷的非凡气象。唐代时,元旦朝会的规模更胜往昔,连外国使臣都远道而来参与盛典。诗人厉玄在《元日观朝》中写道:“玉座临新岁,朝盈万国。火连双阙晓,仗列五门春。瑞雪销鸳瓦,祥光在日轮。天颜不敢视,称庆拜空频。”大殿之上帝王端坐,阶下百官与来自异域的使者济济一堂,共同虔诚地朝着御座方向叩拜。

相较于宫廷诗的规整,友朋间的元旦唱和则增添了几分随性与温情,成为文人雅士庆贺新岁的独特方式。明代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记载了一段诗坛佳话:内阁首辅申行时与诗人王穉登同乡同龄,二人早年间便结下深厚情谊。申行时罢归乡后,每逢元旦必定亲手写下一首七律寄赠王穉登,对方收到后立即刻诗回赠,随后将两首诗一同贴在书斋的墙壁上,整日观赏,直到来年新诗作成才换下旧稿。如此年年往复,整整二十一年从未间断!这份以诗为媒的情谊,至今读来,依然令人感慨不已。

翻阅典籍,其实,元旦的烟火气更多藏在老百姓的欢声笑语里。明代诗人陈献章的《元旦试笔》堪称一幅鲜活的民间贺岁图:“邻墙旋打娱宾酒,稚子齐歌乐岁诗。老去又逢新岁月,春来更有好花枝。”邻家的酒坊正忙着酿造待客的佳酿,孩子们高声吟唱着贺岁的诗篇,家中的老者看着眼前的热闹景致,抚须轻叹又逢新岁,想到春日将至花枝满庭,眉眼间尽是笑意。这短短二十八字,将元旦日的居家宴请、